



■ 浙江工商大学文化精品研究工程

■ 改革开放40周年浙商研究院智库丛书

运河文化

朝廷之厨

杭州运河文化与漕运史研究

周鸿承 / 著

融入“一带一路”与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理念

丰富的史料 珍稀的图片
呈现杭州运河漕运文化历史变迁
寻找江南美好生活的“杭州模式”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

代

■ 作者简介

周鸿承，博士，浙江工商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历史系讲师，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东亚研究中心访问学者，主持2017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及杭州运河（河道）研究院委托课题多项。





■ 浙江工商大学文化精品研究工程

■ 改革开放40周年浙商研究院智库丛书

上架建议 运河/文化研究

ISBN 978-7-5178-3083-2



9 787517 830832 >

定价：48.00元



■ 浙江工商大学文化精品研究工程

■ 改革开放40周年浙商研究院智库丛书

运河文化

朝廷之厨

杭州运河文化与漕运史研究

周鸿承 / 著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

杭州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朝廷之厨：杭州运河文化与漕运史研究 / 周鸿承著.
—杭州：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8.12

ISBN 978-7-5178-3083-2

I. ①朝… II. ①周… III. ①运河—文化研究—杭州
②漕运—交通运输史—研究—杭州 IV. ①K928.42
②F55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77558 号

朝廷之厨：杭州运河文化与漕运史研究

CHAOTINGZHICHU: HANGZHOU YUNHE WENHUA YU
CAOYUNSHI YANJIU

周鸿承 著

责任编辑 唐 红 谭娟娟

封面设计 王好驰

责任印制 包建辉

出版发行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教工路 198 号 邮政编码 310012)

(E-mail: zjgsupress@163.com)

(网址: <http://www.zjgsupress.com>)

电话: 0571-88904980, 88831806(传真)

排 版 杭州朝曦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高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3.5

字 数 211 千

版 印 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78-3083-2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营销部邮购电话 0571-88904970

丛书编委会

总 主 编：陈寿灿

副总主编：李 军

副 主 编：范 钧 鲍观明 吴 波

编 委（按照姓氏笔画）：

于希勇 马 良 马淑琴 王江杭 刘 杰

肖 亮 余福茂 周鸿承 姜 勇 宫云维

徐 锋 徐越倩 高 燕 陶 莺 黎 常

总 序

当代中国社会 40 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与当代浙江发展的“浙江模式”及当代浙商的成长是一个相互辉映、互促互进的动态历史进程。一方面,当代中国改革开放伟大进程既成就了当代“浙江模式”的发展奇迹,也成就了当代浙商的辉煌,并因此成为考察“浙江模式”与浙商成就的基础视界;另一方面,当代“浙江模式”与浙商以其自身的耀眼成就与成长轨迹诠释了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的时代特点,涉及各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结构性样态与转型范式。与之相应的是,作为改革开放之潮头阵地的浙江经济及作为改革开放之急先锋的浙商所代表的发展理念、未来趋势也在某种程度上指明了当代中国全面改革开放的可能方向。

所谓“浙江模式”,是指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及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进程中,发源于“温州模式”的以市场为主导、民营经济为主体及服务型地方政府建设为特征的当代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最具活力的经济模式。“浙江模式”的最主要特色在于创新——特别是通过民间尝试性制度创新——形成了民间投资、民间运营和民间分享的“民有、民营、民享”的自我循环体系,型塑了内生型的自组织的生长动力系统,并在结合社会发展与政府治理模式创新的基础上,较早且较为系统地解决了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企业改制与产权改革等问题。可以说,“浙江模式”极为动态地呈现了经济体制改革图景中社会发展的内生型逻辑:一方面,制度变革首先为个体私营经济、民营经济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并因此成为促进当代中国个体经济、民营经济发展的直接力量;另一方面,基于个体创业或集体创业的浙江个

体私营经济和民营经济发展实践,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锋,并为制度变革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实践依据,从而成为推动制度变革的积极力量。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温州模式”扩展至台州、宁波、绍兴、金华和杭州等地。进入 21 世纪,“浙江模式”又率先在乡村振兴、电子商务、海外并购、绿色金融等领域迅速发展,极大地拓展了“浙江模式”的恢宏图景,不但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中的道路开创与引领方面有所建树,更重要的是,“浙江模式”还在当代中国发展的“中国经验”的型构中,为全球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提供了极其有益的“中国道路”与“中国方案”的战略借鉴。因为,在本质上,“浙江模式”代表的是新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方向与策略指引下的市场经济,而“浙江模式”的成功代表了中国道路与中国方案的科学性与有效性。

当代浙商是浙江模式的最先锋力量,他们因特色的发展道路与辉煌的成就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经济领域最引人瞩目的群体。当代浙商,萌芽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即改革开放初期,在 80 年代商品经济和市场发育的进程中积聚了最初的资本力量;而后,在 90 年代市场经济体制建构的实践中迅速成长,并伴随着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和企业改制、产权改革等一系列的改革绘就了恢宏的浙商新画卷。当代浙商在 90 年代之前的发展历程,最为生动地呈现了他们自主改革、自担风险、自我发展、自强不息的“四自精神”。进入 21 世纪以来,当代浙商又成为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化进程的先锋力量,迅速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积极布局,在世界创业与全球并购中崭露头角。可以说,在当代中国,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进程中,当代浙商因其在国内外众多经济热点领域中的活跃表现与巨大成就而成为被公众广泛认可的地域性商帮。它既充分诠释了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又深刻揭示了作为浙商成长的“浙江模式”的实践价值。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不论是当代浙江经济发展的“浙江模式”还是当代浙商创造的巨大成就,都离不开特定的文化支撑与引领。马克斯·韦伯在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

精神》一书中阐明了一个关于经济发展与文化支撑的真理性命题,即“任何形态的经济发展都必定内蕴了特定的文化力支撑,缺少这种文化力的支撑,任何形态的经济发展都不可能获得持续的生命力”。这一命题说明,当代浙江经济发展必定基于特定的文化力支撑,毫无疑问,浙学传统才是浙商文化、浙江经济发展的源头活水。而浙学传统所代表的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地域性学术,因为,无论是从其学术要旨的维度还是从其学术的实践精神维度考察,浙学传统所代表的其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承继与创新性发展,并在这种承继与创新性发展中成就独特的浙商精神,其要旨有三:①以义和利的义利观。浙商精神中的以义和利的义利观既是对儒家传统的义利观的继承,又在永嘉事功学说的基础上有所开掘:一方面,永嘉事功学说的基本旨趣在于经世致用,它承继了二程的“义为利之和”的义利观,强调义和利并没有绝对的分别,即所谓的“圣人以义为利,义安处便为利”;另一方面,永嘉事功学说虽提倡事功趣向,但其事功并非以个体功利为目标,并非如道学家所批判的“坐在利欲的胶漆盆中”那样,而是始终把国家民族的社会公利置于私利之上。叶适所倡导的即是“明大义,求公心,图大事,立定论”的“公利主义”精神。②知行合一。知行合一是阳明心学的核心要旨,一方面它强调知中有行,行中有知,反对把知与行截然二分化。故王阳明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另一方面,阳明心学的知行与道德是高度一致的,在四句教中就有“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故此,其知行观内蕴了深刻的道德追求。正是这种以知善为善行的取向成就了浙商的儒商气度。③包容开放精神。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角度看,两宋以来,浙学绝非只意味着狭隘的地域性文化发展:永嘉学派、金华的婺学代表了儒家文化在浙江的传承与发展;象山心学虽盛于赣,但象山之后心学的最盛况发展却仍在浙江,先有甬上心学承象山衣钵,后有阳明心学之气象大成。朱氏闽学源于且盛于福建,但朱熹之后,闽学在黄榦之后便转向浙江,黄震是闽学在浙江最具代表性的学者,也是闽学后期最具代表性的学者。由此不难看出,浙学发展最为完美地体现了创新与融汇乃是成就学术气象的根本。

在浙学激荡成长的过程中确立起来的浙江精神、浙商传统也因此成为最富于包容与开放的精神。

值此当代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之际,我们推出“改革开放 40 周年浙商研究院智库丛书”,拟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恢宏图景中审视当代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浙江模式”“浙江经验”与“浙商精神”,既在历史的回溯与反思中深究未来浙江发展的应然方向与实践路径,又在“浙江模式”“浙江经验”与“浙商精神”的系统阐述中挖掘后发地区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与实践经验。收入本丛书的研究成果,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浙江经济发展研究与浙商研究,它们不求面面俱到,但求视界独特;不求论述系统,但求思想创进;它们既着眼于揭示当代浙江经济社会发展与浙商精神的文化真谛,又努力澄清人们在相关问题上的认知误区。

《中国范本:改革开放 40 年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的理路与成就》一书通过介绍改革开放以来义乌市场的发展历程,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的确立与进展;“一带一路”背景下义乌市场竞争新支点、电子商务与物流业的新发展等内容,展现了义乌打造国际贸易综合改革的创新之路。《以利养义:改革开放 40 年浙商参与公益研究》则从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与完善的视角解读了浙商及其文化,并从企业家的社会效应维度审视了浙商的公益参与,阐明了浙商的公益参与在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方面的重要作用。《中国模式:中国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试点实践与创新经验》在全面回顾当代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以来电子商务及跨境电商发展历程、趋势与动因的基础上,从微观、中观和宏观的角度系统阐述了跨境电商相关理论;在总结我国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试点背景与历程、试点方案、试点成效与存在问题的基础上,从业务模式、“单一窗口”、产业园区、物流模式、制度创新的角度系统阐述了我国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试点的主要内容和实践创新,并从杭州、宁波、义乌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试点建设背景与基础、现状与问题、成效与对策的角度总结了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试点的浙江经验。《治理转型:浙江服务型政府建设研究》主要论述了浙江省服务型政府建设在简政放权、规制权力、效率提升和民生保障等方面的经

验,并提出了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未来趋向。《“撤村建居”:人的现代化和社区融合》一书以多元中心的理论为主导,主要探讨了“撤村建居”社区的基层社会治理以及基层社区重建与“城市化”建设方面的重要问题,阐明了突破“城乡二元分治”的基本路径及如何通过完善基层民主自治实现“人的城市化”等问题。《健康浙江:社会健康治理的方法与实践》一书以当代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为背景,系统梳理了“健康中国”发展的主要脉络,并在中日社区健康教育比较的基础上,阐述了浙江杭州市 30 个街道、300 个社区在社区健康教育方面的典型案例和成功经验,阐明了将社会工作方法融入公共健康教育,以及从以卫生管理与控制为目的的行政主导型健康教育到个人自发参与学习的以居民需求为核心的公共卫生健康教育发展的实践路径。《浙商与制度环境的共生演化:企业家精神配置的视角》一书基于企业家精神配置理论,对转型经济背景下浙商的行为进行解释,构建了企业家与制度之间的互动分析框架,并在总结不同时期浙商成长路径、机制和模式研究的基础上,从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诠释了浙商 40 年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行为。《浙学传统与浙商精神》深入探究了浙江思想文化与社会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阐明了浙江文化与浙学思想传统及浙江精神之间的内在关联,并揭示了浙学的基本精神对当代浙江乃至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文化建设的重要价值和普遍意义,以及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中国商业史研究 40 年》是第一部针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商业史研究的学术总结类专著,作者系统梳理了近 40 年来的中国商业史研究及其走向,并简要介绍了相关的研究论著、研究团体和研究机构等。《南宋临安商业史资料整理与研究》通过对正史、地方志、笔记小说等有关南宋临安商业资料的整理,深入研究了南宋临安的商业状况,再现了 700 多年前杭州商业的繁荣盛况。《朝廷之厨:杭州运河文化与漕运史研究》一书通过中西方历史文献、档案资料的比较研究,立体地呈现了杭州历史上的漕运文化的历史变迁、演变特征与区域特点,并在大力倡议“一带一路”及大运河文化带构建的时代背景下,探讨杭州漕运文化的历史遗产价值。《〈童子鸣集〉笺注》在对《童子鸣集》进行点校的基础上,对童珮生平及交游进行

了翔实的考证,并将相关成果以笺注形式呈现,在为学界提供扎实可靠的古籍整理文本方面有所建树。

整体地看,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40年,是浙江经济快速发展的40年,也是浙江经验、“浙江模式”发展的40年。“浙江模式”并不意味着一个固定的产业模式,作为一种具有典范性的发展模式,“浙江模式”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每一发展阶段都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锋与旗帜,这里既体现了浙商的创新进取精神,也体现了浙商精神与浙学传统在当代浙江发展中的文化力,而这种创新进取的浙商精神与浙学传统的文化力恰是未来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竭的动力源泉!

是为序。

陳青川

2018年10月30日

本著作是以下项目资助成果：

杭州运河(河道)研究院运河学研究课题“杭州运河漕运史研究”

序

周鸿承博士的《朝廷之厨：杭州运河文化与漕运史研究》一书即将付梓，可喜可贺！我从事运河史研究多年，每每憾于研究人才的缺乏以及研究选题的“冷僻”，而今读得此书，有眼前一亮之感。虽发于萌蘖，且待其琬琰。

在“大运河申遗成功”与“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背景之下，运河之水有些“温热”。这种温热来自几千年河流本身积蕴的力量，也来自国势强盛背景下的文化自信。沸腾与冷却的辩证，也让运河的研究者们，将理性思考与感性情愫放置在一起，来考量作为研究对象的运河的真正价值与内涵。可以说，运河“本体”与“漕运政治”是以往研究的重点，而今“运输”之河道兼具了“文化遗产”的功能，又或者说，运河的复杂性已经让其成为一个新的学术研究增长点。事实上，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大运河连接的不仅是地域意义上的南北、地理意义上的水系、经济意义上的市场、政治意义上的漕运军政，还有文化意义上的技术、生活、认同等内容，任何一个学科都无法实现对运河的整体认识。因此，观察运河，非若一行游览；研究运河，需要视角多元。

周博士本书的主旨意含二重：其一即是“从经济、社会、政治等多元视角探讨杭州漕运的历史”；其二“论述新时代杭州漕运文化在杭州城市现代化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二者合一，以突出研究“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应用价值”。这样的写作主旨虽是从杭州的地域性出发，但也能形成比较意义上的大运河整体性价值的判断；虽以历史上的“漕运”立足，但又能突出大运河的现实功用。全书将经济、社会和政治

三者融为一体,侧重于河道、漕运与政治变动关系的研究;既讨论漕运经济的政治性作用,商业市场的社会化发展,也探讨大众的观念、情感和心态;既研究河道的开挖疏浚的过程,也关注某个群体的社会地位及观念的流变;既注重文本的分析,也运用图片和地图考察已经成为中国符号的大运河的世界形象。

其实,从研究层面而言,对于区域性运河的研究,有两个问题必须要解决:一是区域性运河漕运与河道管理的特性,以及其存在会形成区域社会怎样的特殊发展轨迹;二是必须把区域性运河放置在整个运河,甚至整个中国社会发展的脉络中来讨论,以此来更细化地认识大运河形塑中国社会文化的作用。事实上,做到以上其中的任何一点都很不易。原因在于以下几点:首先,文献记载的统一性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研究者对漕运和河道工程建设的认知,若没有相对细致的资料,以及对文献资料仔细爬梳的功力,研究者难以在文献记载的大同小异中找到一个区域的特质。其次,受功能论的影响,运河与区域社会发展关系的研究,往往被局限在大运河“促进”或者“阻碍”区域社会发展的畛域中,而事实上,这种观点放置在整个运河区域无疑都是适用的。所以,进行运河史的研究,有贡献的做法是既要归纳特点,同时还应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揭示漕运与社会、经济和人群如何互动的“机制”上面,明白在一定时间和条件之下,人们从事社会活动的最基本的行事方式,特别是办成事应该遵循的基本规律。如何解释运河区域社会内部的起承转合式的发展脉络,也往往因为学术价值观和细致资料的难以获得而被有意无意地忽略。再次,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运河流经多个区域,但是这些河段、区域、城市并非一个独立的个体,若只以地方史的切入点进入,那研究就会脱离“大运河”的背景与中国发展的轨道,或者说,一地一段运河的特点和价值,只有被放置在整个大运河和中国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才能最容易被发掘。通览本书,作者试图在这些问题上进行创新性的研究。

杭州之于京杭,是空间上的一个端点,其承载了运河开挖、疏浚、漕粮中转运输的整个过程。从历史进程来看,《越绝书》所记肇始于春秋

时期的百尺渎(钱塘江北)及钱塘江以南的“山阴故道”,即江南河和浙东运河的前身。虽然此时“钱唐县”或“杭州城”这样的县治或城址尚未出现,但在整个江淮、太湖及宁绍平原之上,运河系统已经相对完备。公元前 222 年,秦始皇始设钱唐县、余杭县(两者均隶属于会稽郡,郡治在今苏州市),并在原百尺渎等运河的基础上通过开凿通陵江等一系列运河工程,完成了南北贯通钱塘江、吴淞江、长江的完整江南运河。处于江南运河南端的钱唐县也因此得运河之利,既通漕运贸易,又行灌溉之利,地方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隋开皇九年(589),废钱唐而置杭州,杭州之名首次出现在历史中。南北大运河的开通,杭州因为浙东和浙西运河的双重作用,而成为运河上的重要枢纽,并因兼具河港与海港的双重作用而迅速成为重要的“东南名郡”。五代时期,吴越国以杭州为都城,大规模地修建与扩张杭州城,运河也随之被纳入城内。其后南宋定都杭州,运河与杭州相互“成就”的关系日益明显,正所谓“南宋时期的运河文化使杭州成为孕育中国近世文化的摇篮”。可以说,自隋至南宋末年,杭州城内水网的畅通,是杭州城市正常发展的条件;运河对江湖海的沟通性也保障了杭州城市位置和地位的稳定。从河政管理的角度,至宋代,杭州运河河道开挖与疏浚已基本完成。因此,管理已经不仅仅局限在疏浚河道方面,而是逐渐转化为对运河环境以及周边建筑的管理保护,这也正是杭州运河河道管理在这一时期所表现出的特色。例如,由于商业的快速发展,运河两岸的住户往往侵占纤道(纤夫拉纤的专用通道),盖造房屋,以利商贸。这种做法会直接导致运河河道狭窄,影响到漕运和商运。苏轼任杭州太守时,就极力遏制市民侵占运河纤道之风,对纤道管理进行立法保护。宋至元明清时期,杭州城市建设规模和布局,也凸显了明显的运河特征,“两市三镇”(湖州市、北关市、临平镇、塘栖镇、笕桥镇)、“九大粮仓及码头”是不同历史时期因运河交通所构建起来的商品交易市场与人群聚落;“城南左厢、城北右厢”也是在杭城“水路互市”的需求之下,城市版图的扩容。

如上,在追寻杭州与大运河关系的过程中,作者着重强调了“地点感”和“时间序列”,即在明晰的地点感的基础上,严格按照事件发生的